

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
资料汇编

3

[1940—1945]

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
资料汇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 编

3

[1940—1945]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三卷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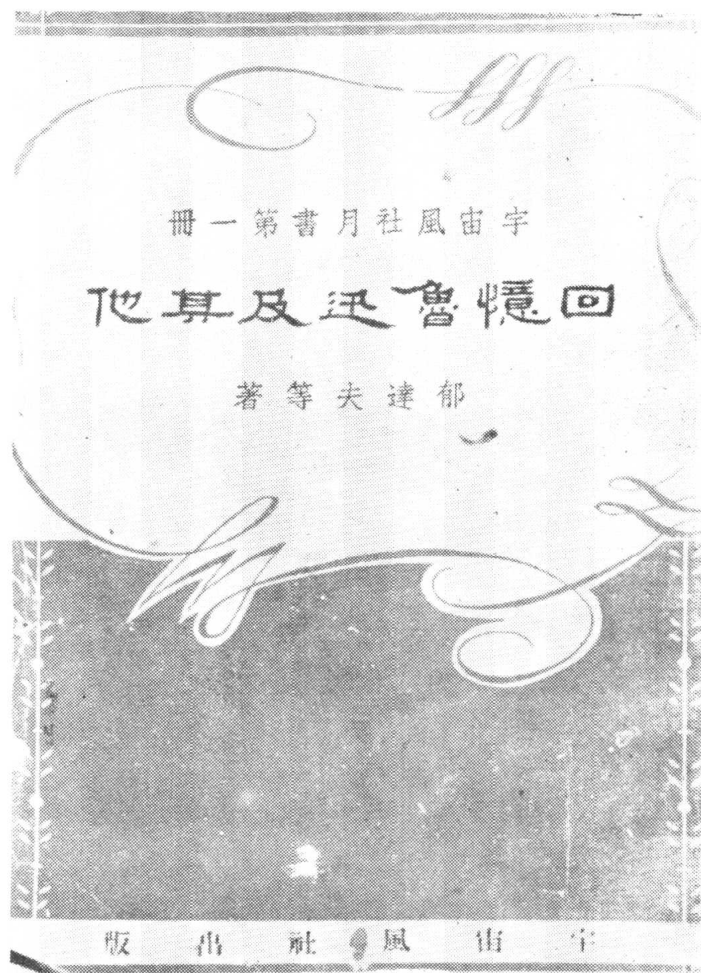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国外发行 隆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92.875印张 9插页 2219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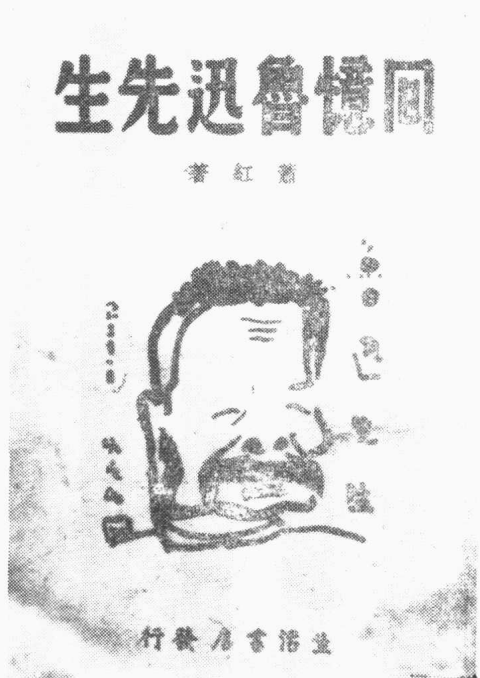
1987年3月北京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
书号：10355·977

25-



郁达夫等著《回忆鲁迅及其他》(上海宇宙风社1940年1月初版)



萧红著《回忆鲁迅先生》(重庆
妇女生活社1940年7月初版)



巴人著《论鲁迅的杂文》(上
海远东书店1940年10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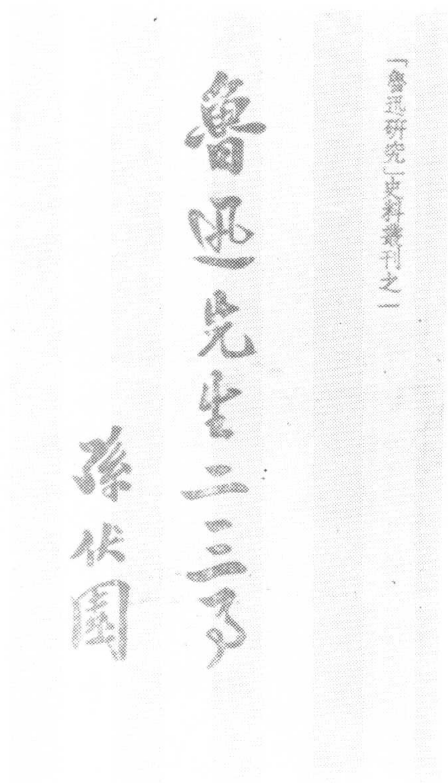
平心著《论鲁迅的思想》(上海长风书
店1941年初版)



萧军编《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延安鲁迅文化出版社1941年初版）（延安纪念馆刘立保同志提供）



路沙编《阿Q——鲁迅名著评论集》（重庆新生图书公司1941年初版）



孙伏园著的《鲁迅先生二三事》（重庆作家书屋1942年4月初版）

魯迅的書

歐陽凡海著



文南出版社

- 上 欧阳凡海著的《鲁迅的书》(桂林文献出版社1942年5月初版)
- 左下 梅子编的《关于鲁迅》(重庆胜利出版社1942年10月初版)
- 右下 郑学稼的《鲁迅正传》(重庆胜利出版社1942年底初版)

關於魯迅

歐陽凡海著
關於魯迅
歐陽凡海著
關於魯迅
歐陽凡海著
關於魯迅
歐陽凡海著
關於魯迅
歐陽凡海著
關於魯迅

• 社 版 出 刊 診 •

魯迅正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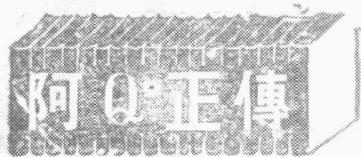
荆有麟著



鲁迅回忆断片

上海杂志公司印行

荆有麟著的《鲁迅回忆断片》
(上海杂志公司1943年11月初版)



徐懋庸注释

26536

鲁迅作品选 注之版 编 署

华北书店 图书馆

1943 版本 皮 藏 章

雜文的藝術與修養

田仲濟著

左上 徐懋庸注释的《阿Q正传》(华北书店1943年7月初版)

右上 田仲济著的《杂文的艺术与修养》(重庆东方书社1943年8月初版)

下 徐懋庸注释的《理水》(华北书店1943年9月初版)

理水

徐懋庸作品選註之二
(「故事新編」之一)
徐懋庸 註 釋

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

第三卷 编者说明

- 一 第三卷收录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止四十年代上半期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
- 二 根据《汇编》第二卷编者说明第二条规定，本卷对所收集到的鲁迅研究资料继续有所筛选，标准渐趋严格，重复性、表态性的资料一般不再收入。
- 三 第三卷编纂过程中，得到鲁迅博物馆阎彤等同志的大力支持，特此致以谢意。
- 四 第二、三卷编纂、排印过程中特请田青云同志协助做编务和校对工作，特此说明并致以谢意。

鲁迅研究学术史概述

(1940—1945.8)

六

(1940—1945.8)

四十年代，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的丰收时期。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可以作为一个历史阶段进行评述。

一九四〇年度，鲁迅研究学术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当首推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同志对鲁迅作出了经典性的评价，揭开了中华民族的鲁迅认识史的新一页，划出了鲁迅研究史的新时代。毛泽东同志指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对本民族伟大人物的最高认识。这个认识既是本民族革命领袖从最高审视点上所作出的科学论断，又是与本民族先进人物对鲁迅的认识一脉相承的。鲁

迅逝世纪念中许多先进人士就提出要从中国现代史的演变中认识鲁迅，仅仅把他当作一个文学家是不够的。毛泽东同志正是这样做的，从中国近百年翻天覆地的历史中去认识鲁迅，才得出了那样高度的评价。这一评价，长期成为鲁迅研究史和认识史上的指针。

如果说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科学评价，是从整个中国革命史、政治史的广大范围内进行全景审视所得出的认识飞跃。那么，冯雪峰的《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八月一日《文艺阵地》第五卷第二期），则是从中国文学史的专门范畴内审视鲁迅和他的作品，所得出的认识结晶。冯雪峰在这篇重要论文中指出：

鲁迅先生对于中国民族的重要不但不逊于高尔基之于俄罗斯民族，而且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超过的。……如果我们仍以外国历史发展的相似的阶段来比较，则鲁迅先生还尽了V·G·培林斯基的历史的任务，在文学建立上又尽了果戈理的任务。

鲁迅先生的杂感，杂文，在文学上是要和但丁、海涅及萨尔蒂科夫·谢特林等人的作品一样不朽的，这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学的奇花，而且是世界文学中的奇花。

这些认识既总结了过去的见解，又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是对鲁迅和他的杂文的文学价值的科学论断和完美概括。

以上是在对鲁迅的宏观认识上所产生的飞跃，至于具体的学术成果，一九四〇年里当首推巴人的《论鲁迅的杂文》一书。

巴人的这本书，基础是一九三八年关于“鲁迅风”论争时在上海文艺界座谈会上的一个报告，后来加工整理，于一九四〇年十月由上海远东书店出版。

巴人的这本书，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第一部鲁迅杂文研究专著，不仅是四十年代鲁迅研究的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而且在近五十年中还没有一部鲁迅杂文研究专著能在学术理论份量上超越这本书，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巴人的这本书，值得后人认真学习的长处是：第一、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的历史范畴内，透视鲁迅杂文内涵的思维方法，透视鲁迅杂文对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突破，透视鲁迅在这一独创文体所体现出的辩证思维特征，这样就有益于从本质上理解鲁迅杂文的价值和特点。第二、从中国古代散文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表现形式大多为偶感性质的记述、不善于系统性的抽象思维的民族思维习惯上，阐明鲁迅采用杂感为主要文学形式的历史因素，这样就有益于理解鲁迅杂文与中国文学传统和思维习惯的历史渊源关系。第三、在分析鲁迅杂文艺术形式时着重剖析内在的思想方法，而不拘泥于表面的字句，这样也有益于理解鲁迅杂文艺术技巧的本质特征。

巴人的这本书，也有其不足之处：在分析历史渊源时固然显得笔力雄浑、才气横溢，而分析鲁迅杂文在现实斗争中所体现的思想方法时却显得有些空泛、单薄了。这些不足，是需要今后的鲁迅研究工作者努力弥补的。

这一年，在鲁迅生平史实资料方面增加了两本书。一本是郁达夫的《回忆鲁迅及其它》，一月份由宇宙风社出版；另一本是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七月份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两本书不仅史实可靠，而且文笔优美，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这一年，鲁迅的两篇小说《阿Q正传》和《明天》，在研究上有新的进展。

先谈《阿Q正传》研究。

三月一日，北平的《中国文艺》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知堂、即周作人的《关于阿Q》，详细介绍了阿Q的原型阿桂的行状

三月十日，天津《庸报》发表了堂堂的《〈关于阿Q〉——周作人先生证明实有其人，因此可悟鲁迅写作的妙诀》。

九月二十八日和十月五日，上海的《中美周刊》第二卷第二、三期连载了林汉达的《阿Q的胜利——心理卫生》，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研究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

十二月一日，重庆的《抗战文艺》第六卷第四期发表的冶秋的《〈阿Q正传〉（读书随笔）》。这篇文章结尾谈到读《阿Q正传》十遍、二十遍，就会产生不同的感觉，一遍比一遍深化，从读者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阿Q正传》深刻的思想含义。这一段议论后来常被研究者引用。

十二月十六日，上海的《宇宙风》第三十五期发表了许钦文的《阿Q哲学浅释》，认为“阿Q思想，阿Q精神，和阿Q逻辑，三者有着连环性。那么我们不妨这样说，阿Q哲学也是有着一贯的精神的，虽然只是阿Q哲学罢了。”

总之，一九四〇年度，《阿Q正传》的研究从采取生活原型的创作过程到研究的新角度、新方法等等，都有所拓展。

再谈《明天》的研究。

六月十六日，桂林的《国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施蛰存的《鲁迅的〈明天〉》。这篇文章逐段解说了《明天》，文章虽然较长，宗旨却只有一个，这就是力图运用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分析单四嫂子的一种非常隐微的性心理，正如作者所总括的：“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描写了单四嫂子的两种欲望：母爱和性爱。一个女人的生活力，就维系在这两种欲望或任何一种上。母爱是浮在单四嫂子的上意识上的，所以作者描写得明白，性爱是伏在单四嫂子的下意识里的，所以作者描写得隐约。”

施蛰存的这种解说很快引起了争议。十月十日，重庆的《学习生活》第一卷第六期发表了海银的《读了施蛰存解说〈鲁迅的《明天》〉以后》，对施蛰存的解说提出异议，认为这样解说是“侮辱了鲁迅先生”。十二月一日，重庆的《抗战文艺》第六卷第四期发表了罗荪的《关于鲁迅的〈明天〉》，对施蛰存的解说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批评，指出：“离开了时代背景、社会意义，是无从说明一篇作品的。施先生不但把《明天》孤立起来看，而且把文章中的一些小动作也孤立起来看，甚而至于歪曲了原作者的含义，而完全加进了解说者自己的意见，这是非常大胆的事。尤其是要把这种解说拿给‘开始欣赏文艺作品’的青年看，将发生着怎样的影响，是可想到的。”

施蛰存对《明天》的解说自然是不能令人完全苟同的，但是作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的分析角度，还是有开拓思路的积极意义的。这场关于《明天》的别致讨论，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一年，在鲁迅研究学术史上应予以适当的注意。

一九四一年度，鲁迅研究史上最大的事情是《鲁迅研究丛刊》第一、二辑由延安鲁迅文化出版社出版。

《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于一月份在延安出版。这辑研究丛刊相当全面地论述了鲁

迅的生平、思想和著作。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推艾思奇的《鲁迅先生早期对于哲学的贡献》。

艾思奇的这篇论文从中国近代辩证法思想发展史的理论高度，详审地考察了鲁迅早期所处的时代环境，分析了他五篇早期论文中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指出“在他的思想里，辩证法不只是发展了某一点，某一方面，某一原则，而是呈现了整个系统的雏形。”这一科学论断，不仅对于正确认识鲁迅早期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正确认识鲁迅整个的思想发展道路。艾文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珍贵的学术论著，除了它本身的科学结论和理论分析始终放射异彩之外，还启示鲁迅研究工作者认识到：要深入地研究鲁迅这样的伟大思想家就必须努力加强哲学理论修养。

丛刊中还有何干之的《中国和国人的镜子》一文，比较全面地归纳了鲁迅关于中国社会状况和国民性弊病的言论，不过罗列过多而理论分析显得不足。而署名须旅的两篇论析鲁迅小说《伤逝》和《离婚》的文章：《一出悲壮剧》和《辛亥的女儿》，却洋洋洒洒、文锋犀利，很有理论水平。

这一年里，出版和发表的重要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还有：

平心的《论鲁迅的思想》（上海长风书店三月版）。这本书是继《思想家的鲁迅》之后，平心的又一部鲁迅研究力作，后来更名为《人民文豪鲁迅》，多次再版。这本书在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的价值是：第一、最早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全面论述了鲁迅的战斗的现实主义、启蒙主义和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后来再版时改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第二、最早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的对立统一规律，辩证地分析了鲁迅思想中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三、最早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阐述了鲁迅解剖与批判中国国民性、担负民族自我批判任务的重大意义。总之，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撰写的第一部全面论述鲁迅思想的鲁迅研究学术专著，是四十年代鲁迅研究的重要收获。

郭沫若的《庄子与鲁迅》（四月二十日《中苏文化》第八卷第三、四期合刊）。这篇文章从语言文字到思想趣味，详细归纳了鲁迅与庄子之间的关系，是最早探索鲁迅与古代思想家、文学家的历史联系、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但是这种早期的比较研究文章还是初步的和肤浅的，仅限于表面字句和现象的并排罗列，而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这个缺憾由后来的鲁迅研究工作者逐步弥补了。

周扬的《精神界之战士——论鲁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学观，为纪念他诞生六十周年而作》（八月十二、十三、十四日《解放日报》）。这篇文章详尽而深入地分析了鲁迅早期的个性主义思想、所受尼采的影响，特别是第一次探索了鲁迅初期的浪漫主义文学观。是四十年代的鲁迅研究力作。

除了以上重要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之外，还有一篇漫谈鲁迅研究的短文值得一提。这就是茅盾的《研究鲁迅的必要》，九月十一日刊载在香港的《华商报》上，后来很少有人注意，也未收入集子，其实茅盾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两段话对认识鲁迅和研究鲁迅很有指导意义。这两段话是：

“三十年集”不是一部小说或剧本，然而正惟其不是一部小说或剧本，正惟其不是一部著作，所以无论就综合而批判过去的文化成果，或就批判当时形相，提出新问题诸点看来，

都更其精辟深入而丰富。要认识现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之特点与归趋，我们必先了解过去，而“三十年集”就指引了一条了解的道路，供给了探研启发的丰富的资料。

我们不反对人们从思想的高超，观察之深刻，乃至从文学技巧之完美，等等上头，去谈“三十年集”。然而我们必须指出，“三十年集”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主要是因为这是中国文化优秀成果的结晶，是三十年来中国文化思想大变动时代的分析镜，他是民族文化继往开来的著作。

这实质是告诫人们不要仅仅把鲁迅当作一个文学家，不要仅仅从文学角度认识鲁迅和研究鲁迅，如果仅仅将鲁迅研究局限在文学的范围里，路子就会很窄，许多问题也不会得到很好的解决。鲁迅是中国的文化巨人，他的著作是中国文化优秀成果的结晶，最完善地体现了现在中国的文化思想之特点与归趋，只有从中国文化思想的广阔范畴内认识鲁迅和研究鲁迅，鲁迅研究才能有广大的前景。

这一年里，《阿Q正传》和《明天》的研究又有所进展。

一月十日，《文艺阵地》第六卷第一期发表了张天翼的长篇小说《论〈阿Q正传〉》。张天翼从一位作家的角度谈了初读《阿Q正传》的印象，分析了阿Q的命运，并以对话形式讨论了阿Q性格的典型性。一月份，《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立波的《谈阿Q》。周立波认为鲁迅“画成了一个生动的阿Q的肖象，和辛亥革命的一幅真实的图画。”“是关于中国精神文明的剖解。”并分析了鲁迅“把整个旧中国的缺点，栽在一个农民身上”的原因：第一、“鲁迅熟悉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农民生活的弱点。”第二、“鲁迅是直觉地感到了，半殖民地国家的国民性，带着浓厚色彩，要雕塑我们民族的典型，农民气质，是它不可分离的部分。”三月十日，《自由中国》副刊《文艺研究》第一期发表了艾芜的《论阿Q》。艾芜论述了五个问题：一、作者怎样怀孕起阿Q这个人的？二、阿Q是国民精神病状的综合吗？三、阿Q有没有成为世界典型人物的可能？四、为什么要把精神胜利的特征弄在阿Q的身上？五、作者怎样使阿Q变成活人的？生动、清晰地解释了《阿Q正传》的几个疑难问题。这在鲁迅研究史上还是第一次。八月十日，《文化杂志》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荃麟的《也谈阿Q》。邵荃麟除肯定艾芜在《论阿Q》中的观点之外，特别强调了阿Q的阶级属性，认为：“如果不把阿Q这个典型人物所代表的阶层的特征，阿Q和阿Q所代表的阶层对整个社会的矛盾关系，以及阿Q主义对阿Q这个阶层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挖掘出来，则很容易会把阿Q单纯地看作代表中国国民的一种典型，而把典型的阶层本质忽略了，这样就会和另一种对典型的误解——说典型是代表国民性的误解，混淆起来。”专门著文强调阿Q典型性格的阶级属性，邵荃麟是第一人。这些讨论《阿Q正传》的文章，十一月份由路沙编为《论〈阿Q正传〉》一书交桂林草原书店出版。

关于《阿Q正传》的文章，还有两篇值得注意。一篇是侯外庐的《阿Q的年代问题》（十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新华日报》），以哲学史家的眼光考察出阿Q是“拆散时代”、即满清封建王朝崩溃、新制度又没有建立时代的农民典型。另一篇是荷影的《关于“堂·吉河德”和“阿Q”——并介绍〈解放了的堂·吉河德〉》（八月十六日《上海周报》第四卷第八期）。这篇文章虽然仅是一篇短短的剧评，其实却是第一个拿阿Q与堂·吉河德这两个世界文学中的相似典型进行比较的文章，在鲁迅学的比较研究中是具有

开创意义的。

关于《明天》又有两篇文章和施蛰存提出商榷。一篇是陈西滢的《〈明天〉解说的商榷》（一月十六日《国文月刊》第一卷第五期）。陈西滢认为《明天》“没有什么深奥意义”，“只是很简单的一个人生小悲剧。它的动人处，就在单四嫂子的孤寂，空虚，无法解除的绝望。若是看进去了另外有什么爱情的成分，便大大的减少了它的动人的力量，却并没有增加任何趣味，或对于人生的了解。”施蛰存“解说《明天》一文，也许使人得到很多的启发。只是有些地方，也与圣叹文一样，觉得他未免过于深求。”另一篇是署名忠的《“听到”和“知道”的商榷》（一月十六日《国文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对施蛰存文章的个别词句作出商榷。对于这些商榷，施蛰存并不同意。十二月十六日，《国文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发表了他的《关于〈明天〉》，重申了他以前的意见，并直接说明他依据的是佛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认为：“鲁迅先生在文艺上并不是一个弗罗乙德派，但是谁能说他一点不受影响？鲁迅先生作小说的时候，正是霭里斯与弗罗乙德在中国时髦的时候。况且，弗罗乙德分析达·汶岂的‘穆那·丽沙’，以为是有‘Libido’存在着。当达·汶岂的时候，根本也无所谓心理分析这个玩意儿，但也没有人说弗罗乙德胡说八道。我以为对于文艺作品的解释，我们应当作如是观。”施蛰存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要繁荣学术、繁荣鲁迅研究，就应该允许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审视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思维空间。

总之，一九四一年度的鲁迅研究是四十年代的第二个丰收年，主要成果表现在鲁迅早期哲学思想、文学观、启蒙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以及《阿Q正传》、《明天》等作品的研究方面。

一九四二年鲁迅研究最重要的收获，无疑是于这年五月由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

这部长达二十余万字的专著，记述和评论了鲁迅从诞生到一九二七年初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大半生生平业迹和思想著述，可以说是鲁迅大半生的一个评传，是空前未有的一部系统性的鲁迅研究专著。这部专著的特点是：第一、对鲁迅所处的时代环境展开了更为详尽、充分的叙述，以此为背景综合考察了鲁迅思想、著作的发展脉络，因而比以前出版的鲁迅研究专著更为丰厚和扎实；第二、把鲁迅的生平、思想和作品结合在一起进行理论分析，不是将三者割裂开来，讲生平时只讲事迹，讲作品时光讲书本，而是讲生平时着眼于思想状况，讲作品时分析思想，分析思想时又不脱离生平和作品，也就是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鲁迅思想发展过程的关系上，来认识他的作品，因而比以前出版的鲁迅研究专著更富有立体感；第三、作者的理论水平较高，不拘泥于前人之见，直抒自己独立思考之后所得的见解，并进行比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因而常有闪光的灼见，例如关于鲁迅杂文思想方法问题的论述和对于鲁迅早期文学观的分析等等，都是启人深思的。这部书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不足是有些地方提法欠妥，对鲁迅世界观的转变缺乏足够的注意。

一九四二年鲁迅研究领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资产阶级右翼文化阵营对鲁迅的攻击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连续出版了两本否定鲁迅历史地位的小册子。一本是梅子编的《关于鲁迅》，这年十月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这本册子收入梅子的《鲁迅的再评

价》和郑学稼的《鲁迅与民族主义文学》等文。梅子的《鲁迅的再评价》认为：“鲁迅死了已五年，鲁迅的评价却发生二个绝对相反的结果。有的人把鲁迅‘神化’了誉之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甚至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同样地，也有相反的一面，却把鲁迅当作是一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大罪人，不仅把后期的鲁迅底言行，看作是一群魔鬼的帮闲头子，而且把前期鲁迅底造作，也轻轻一笔抹煞，于是鲁迅变成了一名中国文坛上十恶不赦的不祥之物了！”梅子则认为：鲁迅是有文学天才的人，前期创作了《阿Q正传》等比较成功的作品，“可是后期的鲁迅，是给政治毒害了，断丧了”。另一本小册子是郑学稼的《鲁迅正传》，也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郑学稼的这本小册子粗制滥造，一派胡言，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他的基本观点和梅子如出一辙，就是不得不承认鲁迅小说的文学价值，又诋毁鲁迅被政治耽误了。这本小册子从反面告诉我们两点：第一、鲁迅作品的伟大已使他的敌人也不能不折服；第二、攻击鲁迅的资产阶级右翼文化阵营实在拿不出象样的货色，唯一能够成书的这本《鲁迅正传》竟然这般低劣，更反衬出鲁迅的伟力。

梅子和郑学稼的这两本小册子，代表了四十年代在鲁迅研究史上出现的一股逆流。这股逆流的矛头实质是指向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的。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出了高度评价。这一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是中华民族对本民族伟大人物鲁迅的科学认识，因而也就引起了资产阶级右翼文化阵营的不快，极力企图否定毛泽东同志对鲁迅的这一评价，但是却无济于事。

一九四二年度值得注意的鲁迅研究论著还有：

邵荃麟的《关于〈阿Q正传〉》（十月十日《青年文艺》第一卷第一期）。邵荃麟的这篇论文是针对欧阳凡海在《鲁迅的书》中对《阿Q正传》的分析而写的，虽然没有发表什么新见解，却对《阿Q正传》的研究方法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要对《阿Q正传》这部伟大作品进行深刻的科学研究，首先就必须从作品实际和鲁迅的思想实际出发，而不能从观念出发，拿鲁迅某一篇文章中的某一句话去硬套和零割。这一方法论问题，在《阿Q正传》研究以至整个鲁迅研究中都是有重要意义的。邵荃麟虽然不同意欧阳凡海关于《阿Q正传》的分析，但是仍然肯定“《鲁迅的书》，大体上仍不失是一本研究鲁迅的较好的书，有许多见解，是很卓越的，正确的”。

何其芳的《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十一月二日《解放日报》）。何其芳的这篇文章，比以前的鲁迅周作人比较论更有份量，分析的更为深入和透彻。他从中国八十年的民族觉醒、民族解放这个大的历史条件中，从个人觉醒与民族的、阶级的觉醒、个性解放与民族的、阶级的解放的必然联系中，考察鲁迅与周作人的不同道路，从中引出借鉴，得出了比较高的认识。

这一年，重庆的作家书屋出版了孙伏园著的《鲁迅先生二三事》。这本书是《鲁迅史料丛刊》之一，收录了孙伏园回忆鲁迅的十篇文章。孙伏园是鲁迅的绍兴同乡，又是一九一一年鲁迅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任堂长时的学生。他后来在北京编过《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鲁迅的《阿Q正传》等重要作品就是由他经手发表的。他还是语丝社的重要成员，一九二四年以记者身份陪鲁迅赴西安讲演，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初又与鲁迅在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同事。他和鲁迅接触很多，所写的回忆鲁迅的文章对